

《笠翁一家言初集》考述

黄 强

李渔虽以戏曲、小说名家,但其诗文也自有特色,诚如其《一家言释义》(自序)中所言:“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覬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①清代文人中,诗文集流传于后世且迄今分布广泛者,李渔无疑是一个。从康熙间翼圣堂刻本到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笠翁一家言》异本众出,李渔及身编定的《一家言初集》与《二集》的面貌究竟如何?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先生在其《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首先予以简略的推测^②。笔者曾以孙先生的推测为基础,作了进一步的探讨^③,但笔者当时未见到最主要的版本《笠翁一家言初集》,只能凭借雍正间芥子园主人合编本以及李渔自己关于编撰《一家言》的叙述加以探讨,蹈空逞臆之处在所不免。199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渔全集》20卷,诗文集的校点者对《笠翁一家言》的版本进行了一些梳理,做了很好的工作,也确认了《一家言初集》的存在及其组成部分,但由于仍未见到标名为《笠翁一家言初集》的原本,所以结论依然有疑似之处^④。笔者在终于见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笠翁一家言初集》原刻本后,对李渔诗文集的版本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因至今此本仍无人提及,故本文拟就《笠翁一家言初集》以及相关问题作一考述,不妥之处,仍祈方家指正。

一、《笠翁一家言初集》的基本面貌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笠翁一家言初集》(以下一般仅称《初集》),共四册,十二卷。扉页有“笠翁一家言初集”字样,左下有翼圣堂主人题识云:“先生之书,充满六合,皆属零星杂刻,非其著述本来。兹因海内名流,每入坊间,即

①李渔:《一家言释义》(即自序),《李笠翁一家言》,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卷首。

②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沧洲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页。

③参见拙文《李渔〈古今史略〉、〈尺牍初征〉与〈一家言〉述考》,《文献》1988年第2期。

④《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点校说明》,第二卷《笠翁一家言诗词集·点校说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询诗文全集,答不胜答。是用固请流传,又恐篇帙浩繁,购者不易,分为数集,次第刊行,此其发端者也。”有此题识,足证此本乃原刻本。后有三序,依次为包璿的“李先生一家言叙”,署“康熙九年仲秋初吉山阴同学包璿题,时适届笠翁览揆之辰,遂以为书”;李长祥的《李笠翁一家言序》,径题“古夔李长祥撰”;李渔的《一家言释义》(即自序),署“康熙壬子仲秋之七日湖上笠翁李渔自述”。是书前四卷为文集,卷一目录前署“一家言文集一卷目次”,正文前署“一家言文集之一”,以下各卷类推。后八卷为诗集,卷一目录前署“一家言诗集一卷目次”,正文前署“一家言诗集之一”,以下各卷类推;但卷八“一家言诗集八卷目次”与“一家言诗集之八”下有小字注云:“诗馀”。实际上诗集卷七下半卷就已经纳入“诗馀”。版式为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版心镌“笠翁一家言”五字,下有小字,文集卷一则标“文集之一”,馀类推。此刻本也有疏漏之处:1.《文集》卷二《智囊序》、《诗集》卷四《酒家翁索诗代酒钱韵事也疾书以应》、卷七《避兵前一日自饯》共三篇有文而无目;2.《文集》卷三目录中的《赠蔡魁吾先生联》,在正文中为《赠盐使迟公联》;3.《诗集》卷七目次中从《雪后泛湖》至《拉友看月》共6篇篇名重复一次;4.《诗集》卷五目次先七言律,后五言绝,中间应标注“五言绝”以示诗体的变换,但没有标注。

李长祥的《李笠翁一家言序》仅见于此集。李长祥,字子发,号研斋,四川夔州人,单锦珩《李渔交游考》于其人生平事迹言之甚详^①。《初集》文集四卷收赋、记、文、传、序、辩、露布、联、尺牋等体;诗集八卷收古今体诗及诗馀;显而易见,包序、李长祥序和李渔自序皆为作为李渔诗文集的《笠翁一家言初集》而作。然而,在李渔身后,其著述全集的各种版本纷见叠出,一概不列李长祥此序,原因何在?读罢序文就可以明了;且此序文字尚未见人提及,故节引如下:

笠翁之名满天下,天下之为河右高唐者,非笠翁之曲不以歌;而又有清谈,家户乐焉。才子哉!笠翁常言曰:“汉人之著者,文也;晋则清谭;唐则诗;宋则道学;若元人则直以辞,辞固元人一代之著者也,则一代人之精灵固在此,而其与汉、晋、唐、宋人之争鸣者,固竟在此。”……然天下人之知笠翁者在此,而笠翁实不出此。予常与之游矣,笠翁信辞人也;而笠翁之辞,固出于笠翁之诗,笠翁盖诗人也;又文焉,笠翁盖又能文者也。昔者王右军,负有才者也,人以其书法故,只知其字,不知其才,则右军之才掩于字。元之赵孟頫亦然。孟頫负有才者,人以其书画故,只知其书与画,不知其才,则孟頫之才,掩于书画。今天下之人知笠翁者在辞矣,其于清谭,亦既知之矣,而不知其诗文。吾惧笠翁之诗文,亦掩于辞与清谭,如右军之与孟頫也。……今来福州,笠翁在焉,尽以其所作者驰予。予读之毕,叹曰:“予之知笠翁,若此其未尽乎?则天下人之知笠翁,又安能尽哉?”今读其诗文,又皆独鸣性籁,函吐万有,较之辞与清谭,奚啻由东蒙而陟岱巅,沿

^①单锦珩:《李渔交游考》“李长祥”条,《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199页。

河宗而泛溟渤？听击筑吹竽之余，而忽聆钧天霓裳之奏，快心警目，百倍曩时。今而后，笠翁之诗文，庶几不为辞与清谭掩；非止不为所掩，且见辞与清谭将为诗文掩也。因序之俾行于世。

此序通篇明言为李渔之诗文而作，认为李渔之戏曲和清谈固然不错，但其诗文更佳，因此无法通过个别字句的改动来改变全序的基本指向。而诸本《笠翁一家言全集》所收远不止诗文，包括《闲情偶寄》十六卷，有的甚至纳入《笠翁词韵》四卷，为避免矛盾，只好舍弃此序了事。而包璿《李先生一家言叙》云：“璿又请先生悉发底蕴，因得所著《一家言》全书而快读焉。”这里的“《一家言》全书”可以指称包括李渔诗文在内的一切文体，自然也可以包括《闲情偶寄》甚至《笠翁词韵》，因此，《笠翁一家言全集》的编撰者只是将包璿的“李先生一家言叙”改为“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便轻而易举地将包璿此序置于包括《闲情偶寄》甚至《笠翁词韵》在内的《笠翁一家言全集》之首。至于李渔自己的《一家言释义》（自序），一开头就说：“《一家言》为何？余生平所为诗文及杂著也。”这里的杂著自然是指辩、露布、联、疏、券、誓、引等体，但“杂著”未尝不可用来指《闲情偶寄》、《笠翁词韵》之类的杂书，则《一家言释义》作为《笠翁一家言全集》的自序，也能成立。

名实相符的《初集》的发现，使得李渔诗文集《一家言》版本研究中的若干推测得以证实：（一）《一家言》分《初集》与《二集》先后问世。（二）李渔在编刊《初集》与《二集》时均以自己不同时段的文章杂著与诗歌合编。（三）标题“文集”与“诗集”的做法始于李渔本人，《初集》即已开其端。李渔身后编刊其全集者将《初集》与《二集》中的文章杂著和诗歌分别合并时，沿用了《初集》的“文集”与“诗集”的标题。

此集收入了李渔诗文的主体部分，还有“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和被誉为“南施北宋”的宋琬、施闰章在内的一大批清初名流为李渔这些诗文所作的评批。《初集》的编撰与刊刻，正值李渔在金陵芥子园的刻书业方盛的时候，断断续续，前后历时六至七年。康熙九年李渔游闽请包璿作序；十一年正月离金陵游楚^①，该年“仲秋之七日”自己作《一家言释义》。此集诗集卷五载有七律《别熊元献归白门兼谢一载居停之谊》、《别黄鹤楼》二首，后诗有“往返于斯一载周”之句，前诗诗题与后诗诗句足证李渔逗留楚地一载，于康熙十二年癸丑春返金陵^②。但同年夏又挂帆北上，第二次入都。返金陵之后入都之前，李渔尚有极少篇什载入《初集》，因此，《初集》所收李渔诗文最晚者作于康熙十二年夏他第二次入都以前。但此集最终刻竣问世是在康熙十三年甲寅以后。李渔著述刻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笠翁或许出于企盼儿子健康

①李渔：《新正自秣陵鼓棹梅已盛开历一月而抵汉阳》，《李笠翁一家言·诗集》卷七。

②单锦珩《李渔年谱》中考定李渔康熙十一年游楚并于当年返回金陵的结论与实际出入，参《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78—83页。

成长和未来有成的目的,往往将各子之名附于既是他的女婿同时也是他经营刻书业的助手沈心友(因伯)的姓名之后,共同作为自己著述各卷的编订者,即使是刚出生者也不例外,因而其各子的生年有时能提供某种版本信息。例如此集诗集卷七正文前便有题名云:“湖上笠翁李渔著,婿沈心友因伯、男将蟠同订”。将蟠系李渔第六子,出生于康熙十三年甲寅^①,由此可证《初集》刻成于此年之后,但又不会迟于康熙十五年丙辰,因为李渔《与孙宇台毛稚黄二好友》书云:“弟自春孟移家至杭……四方人士询《二集》曾出否者,日有数辈。”^②李渔晚年移家杭州是在康熙十六年丁巳首春,其时《初集》已问世,所以读者才会询及《二集》,因此,《初集》问世于康熙十三年以后,康熙十五年以前。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此本国内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以外,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李渔研究者之所以长期以来未能重视这一版本,是因为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才对之予以披露。此后,有的清人别集提要或索引中又不以“笠翁一家言初集”标目,例如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上册)云:“《笠翁一家言诗集》八卷,《文集》四卷……康熙十一年翼圣堂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故宫珍本丛刊》第587册收入此本,编者保留了原本的扉页,因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版本信息,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编者又将书名题为“笠翁一家言文集”,不仅与此本既有文集四卷又有诗集八卷名不副实,又与原本扉页的标题相抵触。其实,与原本扉页统一,直接标题“笠翁一家言初集”,最能突出故宫博物院此本的版本价值。

《一家言二集》问世后以及李渔身后,不同时期的芥子园主人出于为李渔编撰《一家言》全集的考虑,对《初集》的面貌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且一律不使用“笠翁一家言初集”的标题,以至于在古籍善本文献信息闭塞的时代,使人怀疑李渔曾经编撰过题为“笠翁一家言初集”的诗文集^③。

二、《笠翁一家言初集》的版本对照意义

《初集》扉页的题识告诉我们,李渔在世时没有编撰过自己的诗文作品全集。他没有急于编撰全集,是出于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动机:“恐篇帙浩繁,购者不易,分为数集,次第刊行。”因此,李渔的计划就是将自己的诗文分《初集》与《二集》先后问世。而且如上所证,《初集》的刻竣问世至早也在康熙十三年,康熙十六年李渔才开始谋划编撰出版《一家言二集》,丁澎的《一家言二集序》后即署:“康熙戊午葵月同里年家弟丁澎药园氏题于扶荔堂”,也就是说,《二集》一直到康熙十七年戊午才准备序刻问世。其后李渔一病经年,到康熙

^①参见拙文《〈龙门李氏宗谱〉质疑》,《李渔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②李渔:《与孙宇台毛稚黄二好友》,《李笠翁一家言·文集》卷三。

^③参见拙文《李渔著述四种考辨》,《李渔研究》,第435页。

十八年庚申正月就去世了。从时间上看,李渔及身没有也不可能编撰自己诗文集作品的全集。

《笠翁一家言初集》原本的出现,提供了李渔在编撰自己诗文集过程中的重要信息,使得不同时期的芥子园主人对《初集》所做的改动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根据此集的内容、卷数、版式以及有没有李长祥的序,来判定现存李渔诗文集各种版本以及其他文献提到的李渔诗文集版本哪些是原本,哪些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凡有李长祥序者必定是原本《初集》,凡无李长祥序但分文集四卷诗集八卷、且版式与故宫博物院藏本相同者,尽管其扉页标题并非“笠翁一家言初集”,实际上却是经过处理的《笠翁一家言初集》。试对照辨析如下:

1.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笠翁一家言》十二卷本。四册一函,计文集四卷、诗集八卷,扉页缺失,李长祥序置于开头,其后才是包璿序与李渔自序。经笔者核对,所收篇目以及版式与故宫博物院藏本全同。显然,这就是《笠翁一家言初集》原本,只是因为标题“笠翁一家言初集”的扉页缺失后,收藏者重新装订时将李长祥序与包璿序顺序颠倒了。再如:《禁毁书目·补遗一》出《笠翁一家言》一部三本,注云:“查《笠翁一家言》系李渔撰,卷六内有《薤发诗》,甚为狂悖。且每卷俱有钱谦益评语,应请销毁。”此本也与故宫博物院藏本《笠翁一家言初集》相同,不是四册而是三册,有两种可能:或文集四卷、诗集八卷分装为三册,每册四卷;或本为四册,每册三卷,佚失一册。

2.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笠翁一家言》二十八卷本。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著录此本云:“文集四卷,诗集八卷,二集十二卷,别集四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自序(康熙十一年),二集丁澎序(康熙十七年)。”此本只是《初集》单行本与《二集》单行本的组合,前十二卷为文集四卷与诗集八卷,虽然有李渔自序而无李长祥序,但实际上就是《初集》。孙殿起《禁书知见录》出《笠翁一家言》,注云:“《初集》八卷,《二集》十二卷,湖上李渔撰,康熙翼圣堂刊。”此本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笠翁一家言》二十八卷本同,但《初集》中缺失文集四卷,《二集》中缺失别集(《论古》)四卷。由此可见,将《初集》与《二集》组合起来作为李渔诗文集合集的做法早已有之。

3.上海图书馆藏“翼圣堂藏板”《笠翁一家言全集》本。上海图书馆藏数种《笠翁一家言全集》,此本为其中之一。扉页上方横题“宇内诸名家合评”,中竖题书名“笠翁一家言全集”。左下有“翼圣堂藏板”章,右下有题识云:“笠翁先生诗笺封启于金陵书铺廊芥子园书坊发兑”,后依次为包璿的“李先生一家言叙”和李渔的《一家言释义》(即自序)。此本体例非常繁杂,共收《一家言文集》四卷,《一家言诗集》八卷;《笠翁一家言二集》十二卷,别集即《论古》四卷;《笠翁词韵》四卷;《耐歌词》四卷首一卷;《闲情偶寄》十六卷;共五十

二卷二十四册。这是一部将李渔著述各种单行本杂凑而成的本子^①,其中《一家言文集》四卷与《一家言诗集》八卷即《笠翁一家言初集》本的内容,目录前与正文前所署也与《初集》相同。

《中国丛书综录》第1册《总目》出《笠翁一家言全集》,叙录云:“清李渔撰。清康熙九年(1670)至十七年(1678)刊本。一家言文集四卷,诗集八卷,二集十二卷,别集四卷,《笠翁词韵》四卷,《耐歌词》四卷首一卷,《闲情偶寄》十六卷。”书后“收藏情况表”中列出了包括上图在内的国内收藏此本的22家图书馆。其实22家图书馆所藏此本并不一致,有“翼圣堂藏板”本,有世德堂重刊本,但后者底本依然是“翼圣堂藏板”本。而各本最前列的文集四卷、诗集八卷,无一例外,即《初集》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初集》本与上述诸本中属于《初集》内容的文集四卷、诗集八卷有少数篇章文字仍有所不同。例如诗集卷一载《怀阿倩沈因伯暨吾女淑昭》二首,其二末六句云:“诚哉笠翁女,惜非笠翁男。即使代父征,终为雌木兰。造物生汝时,谬在毫厘间。”通行本《笠翁一家言全集》中,“造物生汝时,谬在毫厘间”均作“若使续父书,不愧大家班”。《初集》本结尾这两句惜女非男,一抑再抑,不近人情而有损题意,但全诗重在赞赏女儿“或创女红格,或变钗与环。总欲新其制,不屑居篱藩”,遗憾的是“彤管汝亦亲,但未工且嫻”,故尾句乃顺势而出并无抵牾之处。通行本所改两句逆势扬起,回护题意而切近人情,但与全诗意蕴的矛盾显而易见。原句与改句孰优孰劣,本来无关宏旨,但重要的问题是诗句是谁改的?是李渔自己还是阿倩沈因伯所为?如果是李渔自己所为,又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版本中首先改动的?《初集》本与通行本《笠翁一家言全集》的异文尽管少,但类似的例子提示我们,在以后李渔诗文集的校勘中,他本人倾注了最多心血来编刊的这部《初集》原刻本,其价值是无庸置疑的。

三、从《笠翁一家言初集》看李渔若干诗文的写作年限

名副其实的《初集》的发现,为李渔许多诗文的写作年限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如前所述,《初集》虽刻成于康熙十三年以后,却编定于十二年春;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李渔将编《初集》时遗漏的诗文后来编入《二集》的可能性,但必须有确证,而且以常理推测其数量很有限,因此,大体上可以肯定,李渔的诗文以其第二次入都的康熙十二年夏为界,分载于《初集》与《二集》

①上图此本不仅版式体例不统一,而且无全书总目,各种书完全是原版单行本的面貌,因而前后版本信息矛盾的现象屡有所见。例如,翼圣堂原刻本《闲情偶寄》十六卷,扉页上有广告二行云:“笠翁秘书第一种,第二种《一家言》即出。”这则广告存在的时间前提是《一家言》问世以前。可是在上图此本中,《一家言初集》与《二集》都已经是全书的组成部分,而作为全书殿后的《闲情偶寄》,其扉页上这则广告仍赫然在目。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部《闲情偶寄》是原刻单行本。

之中;既然李渔在康熙十一年壬子正月即出游楚地,那么,《初集》中李渔游楚所作诗文以外的部分一般写于康熙十年以前(极少篇什作于其康熙十二年春由楚地返回金陵不久)。根据《初集》中某篇的有无,如果有可能,再结合其自身所提供的信息,判断其写作年限,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足以纠正长期以来研究者推断的某些疏漏。以下不妨拈出数例予以考辨。

《季太翁万太夫人双祭文》 文中有云:“使九州以内,尚有一隅未平,一政未举,是其为国之心未死也。今则四海荡平,康衢鼓腹。”据此,单锦珩《李渔交游考》“季沧苇”条推定此文当作于“三藩”乱平之后^①。然而,《初集》文集卷二载此文,说明此文必定作于康熙十二年夏季以前。况且“三藩”之首吴三桂是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起兵反清,清廷历经八年,于康熙二十年才最后平定“三藩”之乱,其时李渔已逝,焉得作此文?季太翁即季沧苇之父季寓庸,字因是,江南泰兴人,明天启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名在逆案“结交近侍”又次等。李渔文中谓其“退居林下,犹在他人强仕之年”,则崇祯二年定逆案时寓庸退居乡里,年四十。钱见龙等纂[康熙]《泰兴县志》卷三《名臣传》出季寓庸,谓其“寿八十四”,由崇祯二年下推四十四年,则寓庸卒于康熙十二年。李渔在祭文中又云:“予小子,非敢临丧不哀,故作矫情之论”,则此文即作于康熙十二年其游楚返金陵后不久,故编入《初集》之中。

《荔枝赋》、《杨梅赋》、《福橘赋》、《燕京葡萄赋》、《苹婆果赋》、《真定梨赋》 单锦珩《李渔年谱》将《燕京葡萄赋》、《真定梨赋》系于康熙五年李渔由京师入西秦时,将《荔枝赋》、《福橘赋》系于康熙九年李渔游闽时,诸本《李渔评传》略同。查《初集》,此六赋一赋未载,一律载于《二集》卷一,因此,它们必定作于康熙十二年夏季以后。其实细读六赋,其写作年限不难得知。《荔枝赋》前有小序,在小序中李渔推荔枝为至尊无上的佳果之王,将其余五种佳果区别为五等,复云:“五等既定,拟各赋之……荔枝曰:若是则乘兴而来,请自不穀始。”显然,六赋乃李渔晚年一气写成,并非在各地食佳果后即时为赋,故置于《二集》之中。

《归故乡赋》 [光绪]《兰溪县志》卷五《文学门·李渔传》云:“晚年思归,作《归故乡赋》,有云‘采兰纫佩兮,观濑引觞。’盖于此有终焉之志也。”此赋载《初集》文集卷一,且赋中所思之故乡乃兰溪,而李渔晚年思归之地为杭州西湖,故此赋实非李渔晚年之作。

《朱骏文像赞》 《赞》云:“伊何人斯?骏文词伯。惜登名于天府,将鼎餐而肉食。负此溪山,多离少即。愿假丘壑于笠翁,代守山源于弗失。俟汝功成名立归来兮,仍向此中避劳迹。”单锦珩《李渔交游考》“朱骏文”条云:“据此,朱曾转让居处给渔。按层园旧主非朱姓,抑芥子园耶?”^②如果是芥子园,建成于康熙

①单锦珩:《李渔交游考》“季沧苇”条,《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232页。

②单锦珩:《李渔交游考》“朱骏文”条,《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250页。

八年己酉,则此《赞》一般应载于《初集》,而现在却载于《二集》卷六。事实上,此《赞》作于李渔第二次入都期间,《赞》文本身也提供了证据:“旬日之间,题像六七,皆令我忙,于此独适。长安道上皆劳人,何处飞来仙子逸?”既云“长安道上皆劳人”,则此《赞》当作于京师。此《赞》前有《八十四翁张文吾像赞》等,后有《沈亮臣像赞》,均为李渔康熙十二年夏至十三年春在京时所作,载于《二集》卷六,所谓“旬日之间,题像六七”,正是指这些像赞。此《赞》随后而作,必也作于此次入京期间。李渔将朱骏文喻为“长安道上”之“仙子”,乃是艳羨其在京城的居宅“罗山水于膝前,闭松风于一室”。所谓“愿假丘壑于笠翁”,乃是李渔自己美好的愿望而已,并非朱氏曾转让居处给李渔,因此,与芥子园毫不相干。准此,《朱骏文像赞》自然载于《二集》之中,而不可能见于《初集》。

《与陈蕊仙》书 此札载《初集》文集卷四,书中云:“《风筝误》行笥偶乏,无以应命。此曲浪播人间几二十载,其刻本无地无之。”单锦珩《李渔年谱》将《风筝误》剧的作年系于顺治九年壬辰,甚为有见,“然无确证,暂系于此”。现在我们知道,《与陈蕊仙》书置于《初集》之中,游楚诸札以前,当作于康熙十年以前,且前一札《与杜子濂公祖》确切无疑作于康熙九年,此亦可作为参照。由康熙九年上推十八九年,则该剧的问世之年应当在顺治八九年间。

五律《都门报国寺海棠》、《都门报国寺松》 单锦珩《李渔年谱》于康熙五年条下云:“游报国寺,作五律《都门报国寺海棠》,有云:‘莫怪阗车马,三春少并肩。’可证诗作于春季,即此番入京之作。又有《都门报国寺松》一首,不卜作于何时。”^①李渔于康熙五年春与十二年夏两次入都,逗留时日均涉春季,单氏仅凭其咏海棠诗中提及“三春”而将之系于康熙五年实不可靠。《初集》不见《都门报国寺海棠》,诗集卷三却收有《都门报国寺松》,且有熊元献评语云:“是都门报国寺松,一字难易。”熊氏乃李渔于康熙十一年至十二年春游楚时结识,此诗既得熊氏之评,只能作于康熙五年李渔初次入都之时。《都门报国寺海棠》又有“饱雪花逾盛,经风态转妍”之句,李渔只有在康熙十二年夏至十三年春居京师期间经历冬雪之时,故此诗必作于其后一次入都之时,且在李渔晚年由金陵移家杭州后请毛稚黄作评,置于《二集》卷十。

五律《嘤水道中》 单锦珩《李渔年谱》将之系于顺治十七年,谓其年李渔曾在太仓访吴伟业之梅村,嘤水在与太仓相邻的嘉定境内,单氏云:“或亦作于此行”^②。但此诗不见于《初集》,却载于《二集》卷十。欲证明其作于康熙十二年夏以后,除了此版本依据以外,有无其他旁证呢?此诗前三题首题为《泊燕子矶看月与王安节同赋》二首,作于康熙十二年^③;次题《写忧》四首,第一首开

①单锦珩:《李渔年谱》,《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51页。

②单锦珩:《李渔年谱》,《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38页。

③李渔《登燕子矶观旧刻诗词记》载《李笠翁一家言·文集》卷二,《记》云:“辛亥秋,予阻风泊此,曾留一联一诗于亭上……后二年,与小友王安节月夜泊舟,坐饮其上,复题诗二律,词一阕。”

头即“升平才有象，又复虑沧桑”二句；三题为《阻风泊沙渚四顾无人惟芦蒿伴宿而已》，中有“不知前路险，争战几时休”之句；据句意可知二、三题作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三藩”叛清之后。由此可推，此诗乃李渔康熙十二年以后之作，故置于《二集》之中。

五律《广陵归日示诸儿女》 单锦珩《李渔年谱》谓“从季节、心情观之”，暂将之系于康熙四年^①。然而《初集》却不见此作，《二集》卷十收之。这已经提示我们此诗一般不会作于康熙四年。诗中云李渔广陵归日正值“蒲扇三更月，榴花五月天”，而据笔者考知，康熙四年五月，李渔正在游粤途中^②，岂会从广陵归来？又，此诗前一首即上述《礪水道中》，已证作于康熙十二年以后；下一首为《怀王北山给谏》，有句云：“三千京国路，回首片云飞。地隔情难隔，人归梦未归。”显然是康熙十三年甲寅李渔由京师返金陵后怀念王北山而作。介于两者之间的此诗也是李渔康熙十三年间的诗作，可证其此次返金陵后又曾有广陵之行。

五古《怀阿倩沈因伯暨吾女淑昭》二首、《阿倩沈因伯寄诗文入都求改正喜其力学寄诗勉之》 单锦珩《李渔年谱》以三首五古共系于康熙五年丙午李渔首入京师时，以为后一首作于京师，则前二首亦同^③。事实上，二题并非同年之作。前二首见于《初集》诗集卷一，无疑作于康熙十二年夏以前；而后一首则见于《二集》卷八，作于李渔第二次入都时。后者留有王北山（王曰高）的评语：“是父是女，不愧谢庭。”李渔与王北山相聚共两次，第一次是康熙二年癸卯，王氏任江南乡试考官，二人在扬州结识^④；第二次即康熙十二年夏至十三年春李渔在京时，王氏作有《笠翁小像赞》、《赠别李笠翁》等^⑤；故王氏为李渔此诗作评只能是在二人第二次相聚于京城之时，此诗自不可能见于《初集》。前二首与后一首既然并非同年所作，也就无法根据后者作于京师而断定前者也作于京师了。前二首虽见于《初集》，但无论从标题上还是从内容上，均无法断定其乃李渔于康熙五年游京师时所作。

七古《张敬止使君相马图歌》（其小像也） 张敬止，名勳，汉军正黄旗（辽阳）人，荫生。通行本《笠翁一家言全集》中此歌有钱牧斋眉评，钱氏卒于康熙三年，单锦珩先生心存疑窦，在《李渔交游考》中云：“据此，则诗当作于顺治间。待考。”^⑥事实上，此《歌》乃李渔晚年为张氏所作三篇诗文之一。在此《歌》前作有《张敬止网鱼图赞》，故《歌》中云：“张子前作网鱼图，催我题赞唇为枯。今复变图为相马，重来索赞书盈把。”《张敬止网鱼图赞》属于李渔第二次入都“旬日之间，题像六七”中之一。在此《歌》后作有七律《寄张敬止刺

①③单锦珩：《李渔年谱》，《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48、52页。

②⑤参见拙文《李渔交游考辨》“陆圻”、“王曰高”条，《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2期。

④参见拙文《李渔扬州事迹考》，《李渔研究》，第275页。

⑥单锦珩：《李渔交游考》“张敬止”条，《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249页。

史》，诗前小序云：“前绘小像作网鱼、相马二图，倩予作赞。”三篇诗文的先后顺序说明它们均作于康熙十二年夏日以后。而且从后二篇内容的关联看，其写作时间相隔不远。在《相马图歌》中，李渔借题发挥，渴望张勳是能赏识自己于贫困之中的“伯乐”：“眼前有马君知否？盐车困久齿将颓。不甘仍向风尘走，老泪盈盈堕枥中。”《寄张敬止刺史》则云：“老骥长鸣如有待，纤鳞入肆未全枯。庄周伯乐如怜我，拂拭能教困者苏。”前后诗意相承，后者表明李渔又投书出任知府的张勳，重申《相马图歌》中的求助之意。沈瑜庆等编纂的《福建通志》卷三十二《职官志》中，福宁府知府栏出张勳，辽阳人，康熙十五年任，则《寄张敬止刺史》作于此年之后，而《相马图歌》则作于此年之前不久。正因为一赞一歌一诗均作于李渔晚年，因此分别载入《二集》卷六、卷九、卷十一，《初集》中不可能见到。然则《相马图歌》有钱牧斋眉评又当作何解释？查翼圣堂刻本《一家言二集》，此评阙名。钱氏著述遭禁并牵连其作评之书，是在乾隆时期，顺康间自不必因此而阙名，故《初集》中凡钱评诗文均不阙名。清初为李渔诗文作评者达150馀家，评语逾千条，有的评语因遗忘而阙名不足为奇。对此，李渔自己的态度是严谨的，在编刊《二集》时付诸阙如。遗憾的是，李渔身后为其编刊全集者对于评语阙名者往往臆补，而钱谦益、吴伟业因声名之大更易于被借重。此非上述《相马图歌》一例，通行本《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五古《拟古》一首、《捕蚤》二首、五律《闲》一首，均有钱牧斋眉评；卷二《助葬册引》或作绍村评，或作梅村评，卷五《真州夜渡》有梅村评。吴梅村卒于康熙十年，既然李渔的诗文大体上以其第二次入都的康熙十二年夏为界，分载于《初集》与《二集》之中，则有钱氏或吴氏二人评语者自应收入《初集》，但它们一律载于《二集》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诸例中的眉评均非出自钱牧斋或吴梅村，在翼圣堂刻本《一家言二集》中，除五律《闲》的眉评出自李渔晚年交游朱其恭以外，馀皆阙名，因此上述诸作不可能出现在《初集》之中。有了名副其实的《初集》作为参照，李渔身后为其编刊全集者对于评语阙名者的臆补和对于评者姓氏的误改很容易辨别。

以上数例也只是尝鼎一脔，以概其餘；若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排比考校，当续有所得；足见名实相副的《初集》的发现对于李渔诗文写作年限的判断以及进而研究其生平与创作的意义。若单锦珩先生见到此集，定当不至于出现上述判断的困难或疏漏。

随着各种版本的《笠翁一家言初集》的出现，清初以降，对普通读者而言，《初集》的存在意义越来越小。如上所述，今日《初集》原刻本已属罕见，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但时过境迁，已属罕见的《初集》原刻本的版本研究意义又凸现出来，这或许反映了文献流传的某种规律。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